热点透析

转型再平衡：

# 中国经济升级之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世锦

今年年初以来，在需求侧趋势性放缓的背景下，大宗商品价格下降、通缩预期增强、企业去库存和信贷相对收缩等因素相互叠加，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虽然经济增速尚未滑出合理区间，但部分效益指标降幅较大。随着国际经济状况趋于改善、短期需求冲击逐步减退、改革和稳增长政策效应开始释放，预计下半年下行压力有所缓解，全年有条件实现GDP增长7%左右的预期目标。现阶段，政策着力点应放在加大供给侧调整力度上，引导过剩产能逐步退出，促进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同时，更加注重风险管控，着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

## 利于增长的积极因素在积累

**当前，国际环境略好于去年，出口增长稳中趋升。**国际经济延续分化态势。由于各国所处周期阶段和面对的结构性问题不同，导致宏观政策进一步分化，但总体上向趋好或趋稳的方向发展。欧央行QE正式启动，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可能性加大，大宗商品价格有所企稳，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短期有所降低。今年国际经济形势有望总体略好于去年。

一是美国经济稳步增长。3月份失业率维持5.5%，虽然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在连续12个月维持20万以上后有所降低，但就业状态基本恢复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一年多来，产能利用率维持在80%左右。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三年来第一次开始收缩，年中后加息的可能性加大。但市场和美联储都调低了中远期利率预期，意味着即使启动第一次加息，低利率仍将维持较长时间。

二是欧洲经济短期明显好转。欧洲央行3月9日正式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市场已作出积极反应，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国债收益率都明显下降，各项短期经济指标全面好转。

三是日本经济维持低迷。由于实质性结构改革难以推动，日本强力的货币、财政政策刺激的效果已经逐步减弱。家庭平均支出连续11个月下降，新屋开工连续12个月下降。CPI持续下行，从2014年5月的3.7%跌至今年2月的2.2%。受国际油价、国内食品价格下降的影响，CPI可能进一步走低。

四是新兴经济体内部进一步分化。受新一轮改革措施的提振，印度经济表现抢眼。去年四季度GDP同比增长7.5%，创下14个季度以来的新高。截至今年3月，PMI显示制造业连续第17个月扩张。受油价暴跌和乌克兰危机影响，俄罗斯经济陷入低迷。其他经济体受价格下降、资本流出、财政平衡压力和潜在增速下降等因素影响，经济运行短期难有明显起色。

**内需趋势性下行的调整力度减弱。**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速降幅收窄。1-4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6%，较上年同期回落10.4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下降了4.5个百分点。受转折性因素主导和高企的库存决定，房地产投资下行态势短期不会逆转。新执行的信贷政策，对地产销售增长会有一定积极作用，并适当改善投资预期。预计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到5%左右，与去年全年下降了9.4个百分点相比，今年全年降幅会有所收窄。

二是制造业投资降中趋稳。钢铁、水泥等产能已处于峰值附近，重化工业产能整体过剩，房地产市场调整，汽车生产进入相对低增长期，制造业投资中长期调整仍未结束。制造业投资大幅下调的可能性减小，预计2015年有望增长11%左右。

三是居民消费增长维持缓慢下行态势。考虑到储蓄率仍较高、物价下行，以及信息、旅游、文化等新消费热点持续较快增长等积极因素，预计2015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左右。

综合判断，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仍会延续下行态势。但短期去库存、通缩预期、信贷紧缩带来的需求冲击下半年将有所缓解。若不出现较大意外冲击，全年有条件实现7%左右的预期目标。

## 政策重点是加快供给侧调整

现阶段，政策着力点应放在加大供给侧调整力度上，引导过剩产供给侧减量和结构调整，达到与需求侧相适应的新水平，价格企稳，企业盈利能力恢复，才能实现转型再平衡。同时，更加注重风险管控，着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一是加强预期管理，防止市场收缩自我加强。合理引导预期，是当前政策的重中之重。应向社会公布今年已经确定的基建项目和重大工程，稳定市场信心。央行可以适当加大逆回购力度，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下行；适时降低准备金率，释放信贷增长空间；继续重视结构性工具的使用，防止局部风险爆发、传导。适当提高中央政府负债率，发行一定规模中长期国债，支持地方债务重组或基础设施投资。确立短期调控区间，准备好预案和政策储备。

二是加快过剩产能退出和资产重组进程。以产能调整带动资产重组，是重建增长动力和实现再平衡的关键。产能调整中要做好失业人员的社保接续、转岗培训和就业服务工作。要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企业退出政策体系。实施兼并重组的财税、金融支持政策，鼓励优势企业开展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整合各种企业退出支持基金，支持企业减产转产，规范破产清算政策，健全风险应对预案。创新行业规制方式，依照能耗、环保、质量等技术标准和规范，形成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和制度体系。

三是切实放开基础产业，促进投资潜力释放。能源、铁路、电信等基础产业领域仍有一定投资潜力，是当前稳投资、稳增长的重点。可以寻找一些改革突破口，比如以在上海自贸区建设国际石油交易中心为契机，打通国内外石油市场，放开贸易和投资；放开商业潜力大的铁路项目，以现代公司制度的投融资和运营方式吸引外部投资者；电信领域引入以民营资本为主的新基础运营商等。通过放开市场，引入真正竞争者，既释放投资潜力，又提高整个行业包括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

四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稳定投资需求。在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总体下行的情况下，保持今年基础设施投资20%以上的增长，是稳定投资和稳定增长的关键。建议加大中央政府对农田水利和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加快推进已确定的172项水利建设项目，加快实施8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加大乡村公路、行政村聚居区道路硬化等支持力度。推动PPP规范发展，启动公私合作关系立法，减少行政领导变更的影响。

本版编辑 裴珍珍

理论研究

# 靠切实的改革延续人口红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 昉

经济体制改革是推动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引擎。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以顶层设计与人民群众和地方实践探索相结合的方式，切切实实地推进改革，才能真正获得改革红利。

未来要应对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必须要靠改革。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制度环境也确实还有很多增加劳动力供给的空间。比如我们有2.7亿的农民工，这是劳动力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因此这部分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他们通常40岁以后就陆陆续续返回农村，平时的经济波动也可能迫使他们回乡。如果户籍改革能够把这些人变成城市的永久居民，享受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那这部分劳动力供给就会更为稳定，也可以明显地延长人口红利。

除了稳定劳动力数量，另外一方面如果劳动者的质量能得到提高，也是一种新的人口红利。长期看中国的劳动力数量本来就紧张，如果质量也没有提高，不要说延续人口红利，我们想转向创新驱动和生产率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也都可能会做不到。所以，提高劳动力人口的素质必须从现在就抓起。

通常人们认为人口多是经济发展的负担，事实上这是不准确的。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有60%至70%的贡献来自于资本积累，而资本之所以能够得到充足的积累，是因为人口抚养比较低，创造财富的年轻人比较多，老龄人口比较少。再加上人口众多，资本的回报率就高，所以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人口因素的贡献，即所谓人口红利。

当然就业人口多也会带来现实挑战。首先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严峻问题。其实很多国家在某一个阶段都有高校扩招的经历，与此同时会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一个选择是知难而退，减缓高等教育扩张的速度，比如日本就采取了这样的办法，结果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整个高等教育的规模和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开始拉大，这是日本陷入到“失去的20年”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劳动力市场永远是缺乏高素质劳动者的。大学生就业难并不是高校扩张造成的，问题可能是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没有把大学生很好地和雇主匹配起来，或者是很多智力密集型产业发展不充分，一些行业存在垄断因而吸纳就业不足等。克服这些困难，同样必须要靠改革，主张缩小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是短视的观念。职业教育要发展，但以牺牲通识性的高等教育为代价也是不对的。

中国的改革一直是渐进式的。未来新型城镇化是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城镇化，我赞成仍然要继续保持改革的渐进性。但渐进性不是说要拖延，我们必须要有时间表、路线图和军令状。具体到户籍制度改革，我们要区分不同类型的城市。现在讲到在特大型城市推进户籍改革，确实遇到人口密集、环境问题、交通堵塞问题，甚至可能有贫民窟等问题，少数几个特大城市或许应该特殊施策。但是，要严格界定哪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慎重，不能把这个范围过分扩大。

推进新型城镇化可能遇到的难题，不应该成为延缓进行改革的理由。渐进式改革绝不意味着拖延改革，更不意味着不改革。如果大城市的政府没有改革的动力，担心户籍改革会引起更过度的人口流入，这时候我们就要通过研究、通过实验，去看导致城市病的根源在哪里？是因为我们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造成的，还是因为政府的管理能力不够、政府的服务水平不足而导致的？要对症下药，而不要因噎废食。所以可以在实践中去摸索，看到事实以后才能下决心，但是总要有切切实实的推进改革的动作。只有依靠改革，才能尽可能长时间地延续中国的人口红利。

#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需要金融支撑

苏一凡

前日展

**提 要** “一带一路”是我国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布局，我国主动深化与沿带沿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合作，将有效促进亚太和亚欧区域经济整合。在这一战略推进历程中，如何提升金融支撑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一）

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初期主要以“物物交换”为主。随着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商品交换数量、范围与频率的扩大，对金融支持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不管是“丝绸之路”古道上中外古币的发现，还是海上丝绸之路海底打捞上来东西方铜币都印证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与金融共生共伴，丝绸之路孕育和催生金融支持。汉朝以前，丝绸之路沿线上的丝绸、茶叶、象牙等主要商品都充当过实物货币交换。汉朝时期，以金属货币作为东西方货物互相交换工具，加速了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唐朝时期，丝绸之路上形成了以唐朝货币为基础货币的汇率雏形，唐朝货币承担着国际区域货币的角色。宋元朝时期发行的纸币更是在丝绸之路上的西亚、南亚和东南亚广泛流通，其流通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当时世界上任何一种货币都无法比拟的。由此可见，我国古代金融体系有力地支持丝绸之路建设，加速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及东西方的融合。金融在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上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作用。

从历史上看，我国货币使用范围扩展到了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诸多领域，并通过货币和金融这一媒介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紧密连接在一起，不仅加速了丝绸之路沿线贸易与交通运输的发展与繁荣，而且有效地增强了东西方的人文沟通与交流。以史为鉴，实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迫切需要金融发挥积极引领和带动作用。

## （二）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我国在经济增长、脱贫解困方面对人类作出很大贡献，但与世界的互动模式仍然存在被动特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力量对比使得这种互动模式在发生显著变化。新时期我国对区域及全球事务的参与方式，已明显从过去的“韬光养晦”转向更积极主动的作为，积极创造国际新议题，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中国发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必将会带来世界秩序新的风貌。

目前一些金融机构由美、欧、日等传统发达经济体主导。这些机构并非商业银行，功能主要是透过优惠性融资及开发项目，促进经济发展及消除贫穷。但其融资往往附带许多政治条件，而且有先后顺序，也有大小之分，因此，此类融资决定权其实折射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影响力。

我国是既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坚定维护者，也是积极的创新者，正在通过IMF、G20等渠道，以及通过设立亚投行等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完善，同时，将更多的议题和主张体现到国际金融治理领域中去，作为现有国际秩序变革的建设性推动力量，通过主导多边金融机构参与国际金融领域治理。随着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多边金融机构的诞生与成长，会有效促进发展中国家国际融资环境的改善并逐步提升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话语权。

## （三）

组建亚投行是以促进亚太区的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并解决亚洲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资金不足问题为主要考虑，与亚开行和世行是互补关系，不是竞争关系，我国是世界原有金融秩序维护者和执行者。同时，亚投行也是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资金支撑，体现了中国推动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的战略目标。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是以金融方式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目标提供中长期投资资金，与早期成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形成合力，为现有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注入新鲜活力，以增量方式稳步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一、金融支持“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方向与路径

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涉及融资服务、金融合作、金融业开放以及金融与贸易投资便利化、对外开放体系之间的互动等问题。

一是探索如何利用金融力量解决“一带一路”建设所需巨额资金问题。“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资金支持，需要发挥金融的作用，建立切实可行的投融资机制，整合沿带沿路相关国家金融资源，以外汇储备资金、产业基金、对外援助资金为杠杆，撬动全球资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责任、义务与实力相平衡的金融支持方案。

二是尝试以“一带一路”建设促进金融合作、扩大金融对外开放问题。推动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应用力度，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金融开放的试验田，用全球资金之水，灌溉“一带一路”建设之田。

三是以金融合作促进对外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提升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为建立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坚实支撑，开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

目前当务之急是一方面要正确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发展阶段、整体金融实力、金融合作现状和金融利益诉求；另一方面要正确测算“一带一路”建设资金需求总量与结构、投融资方式和利益协调，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中的运用，外汇储备资金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杠杆作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机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方向与路径等。

二、金融支持“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建议

我国必须培育壮大金融力量以适应未来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一带一路”已经从构想迈入务实阶段，要以创新思维切实办好“亚投行”和“丝路基金”，逐步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发起并同一些国家合作建立‘亚投行’是要为‘一带一路’有关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经济合作。设立‘丝路基金’是要利用我国资金实力直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目标。

（1）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治理的建设性改革。为了能够在现有的国际规则体系内提升自己的地位，从改变现有不合理国际规则开始，推动国际金融治理的建设性改革，使全球财富的国际分配相对公平合理。“规则的制定者注定是规则的受益者”。发展中国家亟需在国际规则调整和新规则制定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获取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地位，主动成为国际秩序的“建设性改革者”，以使“一带一路”获得更多国际金融机构支持。

（2）促使亚投行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当今世界面对的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扩散至全球的、一体化的、制度化的以规则为基础秩序的世界，对其进行改变难度可想而知，更为重要的是现有新兴大国自身没有构建全球秩序的经验。因此，原有世界金融秩序仍可维持，只是需要重塑其中一些规则以适应现实的变化。长期主导世界级金融机构的欧美个别国家，虽然很难心态平和地接受来自中国的亚投行挑战，但未来世行和亚开行有可能与我国主导的亚投行等之间建立一个合作关系。因此，我国要积极做好环境和公平制度等规则制定方面工作，积累经验，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展相关谈判提供实证样本和依据参考，进而为我国参与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制定提供中国版本。

（3）做好金融人才储备和议题储备为各国的“民心相亲”服务。金融支撑光有资金还不行，还要有国际金融人才储备和金融议题储备。我们需要建构使“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合作共赢、分享利益所信服的新型金融理论，而且需要拿出具体的行动，特别需要为沿线各国培养一批通晓中国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开发性金融人才。“积水成渊、积土成山”，国家间关系发展需要人才的交流与合作，更需要这些人才为各国的“民心相亲”积累作贡献。

（作者系广东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广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